



▲学者杨沛东认为，中国的应试教育使中国学生把缺乏目的性的活动都看成是没有价值的。（林国明摄影）



▲来自中国的陈晓阳（左）和来自越南的潘安端都是奖学金得主。（李白娟摄影）

学者研究中越学生融入问题 文化差异造成理解误区

周雁冰 / 报道

牛津大学教育系博士研究生杨沛东，前不久在东亚研究所做了一个研究报告，从人类学民族志（Ethnography）的角度，探索本地中国奖学金得主面对的“融入”问题。调查显示，新加坡式英语某种程度上造成新中学生的交流障碍，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也带来理解误区。

东南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许蔚富则在讨论会上表示，越南留新学生与中国留新学生有部分相似经历。但与来自经济崛起的中国学生相比，越南学生似乎没有文化优越感的表现。

杨沛东也是新加坡奖学金得主。他2008年毕业后离开新加坡到英国深造。他说在新加坡留学期间看到一些留学生的负面情绪，因此想要深入了解他们的想法。

杨沛东去年8月回到新加坡，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访问了30名年龄介于18岁到22岁的中国奖学金得主。他们多数来自中国二线城市的中产阶级家庭，目前在我国大学修读工程或理学学士学位。

据了解，我国目前约有10万多名外籍学生在不同的学府学习。其中，政府每年颁发约1000份奖学金给大学本科的外籍学生。

谈及受访学生所触及的融入问题，杨沛东表示就整体而言，中国奖学金得主在新加坡的经历是正面的，所碰到的困难也比在欧美国家要来得小，但是在语言及文化上，仍然存在一些矛盾。

新加坡式英语带来交流障碍

根据杨沛东的研究，中国奖学金得主一般在学习方面没有碰到太大问题，不少人能考到优异成绩。在语言方面，部分人原本以为新加坡是一个纯粹讲英语的环境，来了以后，发现新加坡人基本上都能说华语，因此生活上并没有出现想象中的语言障碍。

念电子工程的一些中国学生甚至笑言，由于系里中国学生人数很多，许多讲师也来自中国，因此他们可在完全使用中文的情况下，在本地大学完成四年课程。既然如此，中国留新学生又为什么会谈及语言的问题？这与一些新加坡人引以为傲的Singlish（新加坡式英语）有关。

杨沛东说：“一些受访者表示，虽然新加坡大学生用华语和中国学生交谈，但是本地人之间用的却是Singlish。当新加坡人用Singlish的时候，中国学生没有办法理解，就算理解了，也很难参与到讨论里。有受访者表示，在一个大家兴高采烈用新加坡式英语交谈的环境里，中国留学生其实会感到某种压迫感。”

杨沛东也从他的接触中发现，对中国学生而言，虽然多数新加坡人很友善，会尝试用华语和他们交谈，但也有新加坡人对中国学生无法讲流利英语表达了一定的“歧视”。

他说：“作为反击，部分中国学生就会在情绪出现不满的时候，批评新加坡学生在两种语言的掌握方面都只有半桶水的程度，觉得他们英语说得不好，也没有办法完整地用华语表达。”

22岁的陈晓阳四年多前从中国山东省泰安市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求学，目前是工程系和商学院的双

学位本科生。她表示，Singlish确实对中国学生的参与感造成一定的影响。她说：“我发觉新加坡学生聊天掺杂了很多方言、马来话，也加进很多语气助词，像‘lah’‘loh’等。他们说话很简短，所以说得快的时候，就会抓不到，产生不容易融入、不适应的感觉。”

不过，陈晓阳也告诉记者，中国学生在新加坡呆久了以后，也就逐渐适应Singlish，甚至学着新加坡人讲英语的方式，以便更融入新加坡社会。

学者关注越南学生的融入

无独有偶，东南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许蔚富在研究报告讨论会上表示，越南留新学生与中国留新学生有部分相似的经历。

在与记者的访谈中许蔚富说，同样的，越南学生到新加坡来，也需要适应新加坡式英语。不过与中国学生相反，越南学生来新加坡以前经常误以为新加坡是一个以华语为主要沟通语言的华人社会。

他说：“越南学生以为我们讲华语，过来以后才发现我们说的是Singlish。他们听不懂，但尽量适应，慢慢熟悉新加坡式英语，基本上还是抱着尊敬的态度。”

根据许蔚富的了解，目前在新加坡求学的越南学生大概有三四千人。其中有约1400人就读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以及新加坡管理大学。越南学生在新加坡成立的学生协会就多达34个。三所大学里都有各自的越南学生会，经常举行联谊活动，和越南驻新加坡使馆也时有联系。

三年前获得本地政府奖学金，从胡志明市到新加坡管理大学商学院念书的潘安端（Phan Anh Tuan）今年21岁。他说自己当年刚到新加坡的时候，对Singlish的理解程度仅有百分之五十，不过今天他已经能够理解百分之九十的交谈内容。

但研究员许蔚富认为，新加坡人应该正视自己的英语程度。“因为这影响到我国教育程度和质量的美誉。开始时，越南学生都认为我们的英语比他们的好，但是随着更多越南人和西方国家有接触以后，就会发现新加坡人的英语讲得不如英美了。”

杨沛东也在讨论中提及，中国学生其实期望和新加坡学生产生有意义的联系交流，建立友情，而一些他接触的中国学生把能和新加坡学生一起“high”作为达到真正交流的指标。但是让新加坡学生很“high”的活动，却是中国学生所不解的。

“大多数中国学生不能完全理解一些活动的意义，譬如迎新营。多数我接触的中国留学生并不十分喜欢这类活动，像在校内到处跑，在泥土里打滚，蒙着眼把脸埋进马桶，三更半夜在一起唱歌……这些活动对他们来说缺乏意义。有受访者说希望办一些有意义、有文化、有深度的活动。”

杨沛东认为，这或许与中国式的教育模式有关。中国实施的应试教育以考试为主，大家都专心

学习，把课外缺乏目的性的活动看成是没有价值的。优秀的中国学生往往觉得读书才是王道，而中国的学府也相对纪律化。本地迎新会的活动看来无聊，是因为中国学府中所有主办的活动都要有它道德、思想的基础和标准。

在日常交流中，部分中国学生也认为无法和新加坡学生进行有意义的交流。杨沛东访问的一名工程系学生就表示新加坡学生一般修养不够。

杨沛东说：“部分受访者认为，在新加坡，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够深刻。他们觉得中国学生之间可以讨论生活、哲学、理想、时政，但新加坡学生似乎对这些不感兴趣，只谈一些表面的东西，譬如哪个餐馆好吃，哪个明星发新专辑，高科技产品几时出炉等等。”

谈及这个课题，陈晓阳表示她也发现双方关心的课题不一样：“我觉得这和成长环境和氛围有关。我身边的新加坡朋友对很多东西懂得很深，但就是不够深。譬如我们对历史文化懂得比较多，欧洲同学就比较理解西方文化，但新加坡是新生国家，所以对流行的东西、新技术可能更感兴趣。”

越南学生的不同解读

对本地学生的评价上，越南学生似乎和中国学生提供了不一样的解读。许蔚富分析说，在他看来，越南学生虽然对自己的文化也有很强的归属感和自豪感，对本地社会也有他们的感叹或批评，但却没有文化优越感。

他说：“他们过来后慢慢认识新加坡，看到新加坡人有母族文化影响，但也有各民族之间一种共同价值观。他们对新加坡相当尊敬，认为弹丸小国可以这样发展是不容易的。”

欣赏本地建设的同时，越南学生也感受到新加坡的都市社会，人与人之间竞争过于激烈，缺乏越南的人情味。他解释道：“他们也觉得新加坡的人情比较淡薄，学生之间竞争太强，比较自私。越南当然也不乏自私的人，但是学生之间会互相帮助的情况更普遍。”

潘安端受访时附和许蔚富的观点，他引用了新加坡式英语，说新加坡学生有“kiasu”的文化，大学里的同学都是为了考好成绩竭尽全力，图书馆时时满座。他到本地企业实习时，也发现新加坡人工作特别卖力，加班是家常便饭。而潘安端所接触的新加坡学生，虽然也有爱逛街购物、爱流行文化的特质，却更多是努力能干的一群。他说：

“我在管理大学接触的同学多数个性外向，年纪轻轻还在念书就很有创业精神，不少新加坡同学已经开始做一些小生意。除了念书勤奋，他们还参加很多课外活动，我觉得自己在新加坡同学这种积极、充实的生活方式当中，学到了不少东西。”

有趣的是，在潘安端看来，新加坡学生是关心时政的。他说：“我觉得他们对新加坡的政治发展很感兴趣。像前不久大选时，我的新加坡朋友都积极参与讨论。虽然没有和他们交流这方面的看法，不过却在网络上、面簿上看到很多不同的意见。”

中国崛起令学生优越感增强？

两位学者许蔚富和杨沛东表示，融入问题在他们所接触的社群里虽然存在，但并不严重。不过本地对新移民融入问题仍缺乏具规模且有系统的研究和调查。

杨沛东认为，尽管问题不大，也只有通过研究和讨论，才能增进互相的理解。这对于新加坡这样一个国际化、五方杂处的社会尤为重要。

许蔚富比较越南和中国学生的反应和态度时说，这两个族群都对各自的文化深感自豪。但在中国学生的部分例子当中，似乎看到了较为轻视的态度。他认为，除了不能适应新环境的压力所带来的一种本能反弹；也可能是接触到别人的文化，对自己的文化、环境进行思考以后，觉得自己的更为优越。

他说：“越南学生不会轻视，因他们出发点较低，觉得新加坡的现代化很成功，很多方面都做得很好。如果我们看80年代过来的中国学生，和今天的中国学生又有很大差别。是不是因为中国崛起了，他们对外地的看法也改变了呢？那么以逻辑来讲，越南经济起飞以后，越南学生是不是也会产生同样变化？觉得自己国家样样都好。”

最好的朋友还是自己人

中国与越南学生或许出发点和观点不尽相同，但两位学生受访者都毫不犹豫地表示，身边最亲近的朋友还是“自己人”。潘安端说，新加坡学生并不排斥外籍学生，他在学校也有不少新加坡朋友，但是这很难超越人在异乡的越南同窗情谊。他说：“和新加坡同学主要是课堂和课外活动上见面，交朋友不是问题。但是学校里有不少越南同学，我们之间的感情很深，群体精神很强，我们也很爱自己的国家。”

陈晓阳则说，缺乏共同成长经历，使两地学生很难成为真正的好朋友：“因为不是一个地方的人，很难说什么就能互相明白，谈到过去也无法产生共鸣。来自北方的中国学生吃饭习惯也不一样，我们经常去牛车水、芽笼一带吃中国菜，新加坡学生不习惯。所以也不是刻意排斥，是很自然出现的情况。”

谈及对新加坡的整体看法，不论陈晓阳还是潘安端都认为我国是一个非常适合居住生活的城市国家。他们毕业后都选择在本地工作至少三年，对于接下来是否会考虑把新加坡当作永久的家，年轻的他们都没有肯定的答案。陈晓阳说，没有完美地方和完美城市，没有完美的人和不需要适应的新环境。

不管是哪里来的年轻人，都只是为了在一个陌生国度找一处容许自己立足之处，在心里做一点建设，感觉温暖和强大，好去面对多变而竞争的世界。



▲来自中国等地的大学生通过各项交流活动，促进与本地学生的相互了解。（档案照片）

你“high”我不“high”

杨沛东也在讨论中提及，中国学生其实期望和新加坡学生产生有意义的联系交流，建立友情，而一些他接触的中国学生把能和新加坡学生一起“high”作为达到真正交流的指标。但是让新加坡学生很“high”的活动，却是中国学生所不解的。

“大多数中国学生不能完全理解一些活动的意义，譬如迎新营。多数我接触的中国留学生并不十分喜欢这类活动，像在校内到处跑，在泥土里打滚，蒙着眼把脸埋进马桶，三更半夜在一起唱歌……这些活动对他们来说缺乏意义。有受访者说希望办一些有意义、有文化、有深度的活动。”

杨沛东认为，这或许与中国式的教育模式有关。中国实施的应试教育以考试为主，大家都专心



▲学者许蔚富认为，越南学生的出发点比较低，因此觉得新加坡各方面都很成功。（郑明达摄影）